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五十九期
2003 年 11 月　　頁 177～214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

胡家瑜、林欣宜 *

摘　要

本文主要從歷史和文化動態對話的觀點，探討新竹苗栗山區賽夏族的族群邊界形塑與區域開發互動的關聯。透過歷史文獻和檔案、民族誌記錄、田野調查資料、和族人自我詮釋資料等綜合運用，一方面試圖檢視地區開發過程中，不同時代階段國家政策、地方資源、和人群互動的變化；另一方面也重新思考跨時代流動變化中反覆再現的「賽夏」特質，以及族群邊界形塑的可能機制。賽夏的例子，顯現出其族群邊界形塑過程，受到新竹苗栗交界山區的人群接觸、交易、移墾、殖民、軍事和行政區劃等各種政治經濟活動的影響，而日漸具體化和強化。但是，隨著社會生活環境的長時間發展變化，反而更凸顯出文化內在動趨力所引導的一些特定運作方向或原則；例如，「開山撫番」以來山區聚落的遷移模式與賽夏聚落性質、賽夏「家名」至「姓氏」的轉換等。總之，從動態對話的角度來思考族群邊界的流動，應該能夠更細緻的掌握歷史過程中人群互動關係的變化，以及理解當代與過去、內部價值觀念與外在刺激持續在實際生活中的對話與連結。

關鍵詞：族群邊界、再現、「南庄化番」、「合番」、「姓氏」符號、文化符碼、集群動力

本文 92.8.18 收稿；92.10.15 通過刊登。

*胡家瑜為現任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林欣宜為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學系博士候選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nzhuang Area and the Ethnic Boundary of the Saisiat in Taiwan

Hu, Chia-yu、Lin, Hsin-yi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discuss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nic boundary of the Saisiat peop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joining Nanzhuang area. By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rchives, ethnographies, field notes, and the Saisiat self-produced materials, on the one hand, we would like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s brought by the changes of state policies, exploitation of local resources and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in different times. On the other hand, we propose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antly manifested "Siasiat-ness" features,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institutions for shaping up the ethnic boundary under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case of Saisiat, it is shown that its ethnic boundary wa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s with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who entered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Xinzhu and Miaoli counties, and also reinforced by the outsid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impacts, such as trade market, land reclamation, military ope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lassification. Yet, in distinction to the external socio-economic changes, certain cultural codes and conceptual schema in the aboriginal society ought to be highlighted as extending agencies for integration. For instance, the special pattern of movement of the related aboriginal settlements since the "opening up the mountains and pacifying the aborigines" (*kaishan fufan*) scheme in the 1880s; and the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 Hu, Chia-y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sin-yi Lin, DPhil. Candidate,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om the aboriginal clan names to specific Han-Chinese surnames with similar meanings. In conclusion, to examine more subtle social change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to measure the ethnic boundary from a more fluid and dynamic point of view, we might have gaine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icated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nd of the continuous discourse between the internal cultural values and external stimulants, as well a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Keywords: ethnic boundary, Nanzhuang semi-subdued aborigines, cultural codes, "clan name" symbols, Hefan aborigines, agency for integr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

胡家瑜、林欣宜

一、文化與歷史的對話

對於文化與歷史間複雜糾葛的相互作用關係，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在《歷史之島》（*Islands of History*, 1985）中做過深刻的剖析。在該書一起始，他就強而有力的提出：歷史隨著事物意義體系而被文化所建構，由於社會的不同而有差異；反之亦然，文化也被歷史所建構，因爲「意義」必須透過行動而一再被重新評價。至於，歷史與文化這二個相對的面向，究竟如何在社會生活中整合？他則認爲必須落實在歷史的主角－人－的行動中達成。一方面因爲人會依據既有的思維模式來理解周遭環境和組織行動計畫，並且賦予事物意義，因此文化會在歷史行動中再生；另一方面人也必然隨著實際行動狀況的需要，主動而有創造性地調整原有思考觀念，因此文化也會在歷史行動中改變（Sahlins 1985: viii）。

從動態對話的觀點來探討文化體系的歷史建構過程，或是由不同文化思維的角度來理解歷史行動的意義，想法雖然很吸引人，但真正落實在一個具體的研究課題上卻並不容易。原因一方面是這二個領域的研究者－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本身對於資料掌握和解讀能力的偏向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因爲二者在視野、方法和關注問題上的差異。人類學者的精力大多放在實地田野資料的採集、分析和詮釋，對於不同時代文字記錄資料的收集和解讀能力，遠遜於歷史

* 本文的完成要感謝「人類學與歷史研究的結合—以台灣南島民族研究為例」研討會中施添福、黃應貴、鄭依憶、夏黎明、何翠萍、林開世、洪麗完、陳文德、陳秋坤、譚昌國等諸位女士、先生，以及論文審查人提供的許多修正意見和具體建議。文中引用的日文資料，則感謝吳密察的協助翻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者；而歷史學者從文獻材料出發，理解過去事件的發展和解釋，但對於不同文化邏輯思考造成的行動差異，卻難有足夠的理解和掌握。二者之間的落差，也可以說是學科取向和學門特性的不同表現。

不過，人類學與歷史學研究仍具有一些共通的本質：二者都需要處理異己的社會；如同李維史陀所言，無論是基於空間距離而衍生的異己、或是時間距離而衍生的異己，二者都必須面對「異己再現」的問題（Levi-Strauss 1963: 16）。雖然「真實」的再現，近三十年來已被視爲一種現代性的神話，因爲再現的過程無法避免一定具有材料的片斷性，以及觀看角度的侷限性；但是，如何增加對再現對象更廣泛、或更深入的理解？或者，是否能夠讓不同材料和不同觀點在共同議題討論上有所交集？這些應該還是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可以思考，並且值得努力尋求超越之處。因此，本文將試著以一個小的區域範圍--南庄地區--當做一個具體對話的空間範疇，並且以當地活動的主要原住民群體--賽夏族—族群邊界形塑與區域開發的歷史過程做爲關注焦點。希望透過歷史檔案、民族誌記錄、以及族群內部詮釋資料等多元觀點材料的綜合運用，重新解讀記錄者與被記錄者的情境位置；並藉著檢視不同時代階段國家政策、地方資源、和人群互動的變化，進一步思考當地歷史發展、「賽夏」社會文化性質、和族群邊界之間的關聯。

二、南庄地區與「賽夏族」做為對話焦點

以中港溪上游南庄地區和當地原住民做爲對話的焦點，有二個特別的考慮因素。第一，南庄地區向來是賽夏族南群的主要分布區域，這個地區在地理上距離清代以來設定的「番界」－土牛線和三灣屯隘－不遠，自清代中葉以來，國家勢力、漢人移墾和山區資源開發衝擊等外部勢力逐步增強之下，可以做爲我們觀察此一地區轉變的焦點。第二，隨著「界線」的區隔和移動所造成區域內複雜的人群流動過程，南庄地區的原住民社會內部也相對地呈現錯綜複雜的族群文化現象；其中，有關當地原住民－現今所稱「賽夏族」的分類界定、移動變遷、與漢人密切的往來關係、和族群意識表現等問題，正是反映區域獨特互動性的重要議題。

「賽夏族」的族群邊界（ethnic boundary）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產生，與一般概念中認爲「賽夏族」與周邊其他文化群體，在日常生活表現上沒有鮮明的區隔有關。許多文獻記錄經常提到「賽夏族」和鄰近的閩南人、客家人、或是泰雅族人，都保持相當密切和友好的關係。歷史材料中看到南庄原住民的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候，也總是提到他們的漢化程度很深，除了可以看到他們使用漢式姓名、與漢人通婚、同時也有收養子和義子的習慣。因此，從血緣的角度看來，似乎很難有所謂「純粹」的賽夏人。尤其，文獻記載南庄地區原住民部落，從清末劉銘傳開山撫番的時期，就有國家力量影響部落頭目的選充；記錄中出現的幾個南庄地區頭目，幾乎都是被收養的漢人。這樣的現象讓人不禁想要問：「賽夏族」究竟是不是一個「族」？如果是，賽夏的「族群邊界」是以什麼樣的機制（institution）維持？而清末以來，逐漸增強的外來行政或軍事力量又帶給原住民本身什麼樣的影響？由於這些問題正好是人類學與歷史研究者共同感興趣的課題，因此以下將以南庄地區的歷史文化變遷做爲具體課題，在對歷史材料進行反芻及對文化行爲的觀察之間，開始我們「對話」的嘗試。

三、文字材料與南庄地區「開發史」

雖然我們的問題焦點在於維持「賽夏族」族群邊界的機制爲何？但「賽夏族」及其他諸多原住民族的名稱，就臺灣的原住民研究而言，不過是近一世紀來的產物。雖然如此，我們仍用後溯方便的看法稱之爲「賽夏」，他們出現在歷史文獻中的場合，大多與進入「賽夏族」分布區域的漢人活動有關係。此一現象主要是因爲，與賽夏族相關的文獻，除了日本時代以後才出現的直接針對「賽夏族」進行觀察的人類學民族誌及田野記錄外，主要皆分散在各方志、清代中期以來的官府行政記錄，以及地契之類的古文書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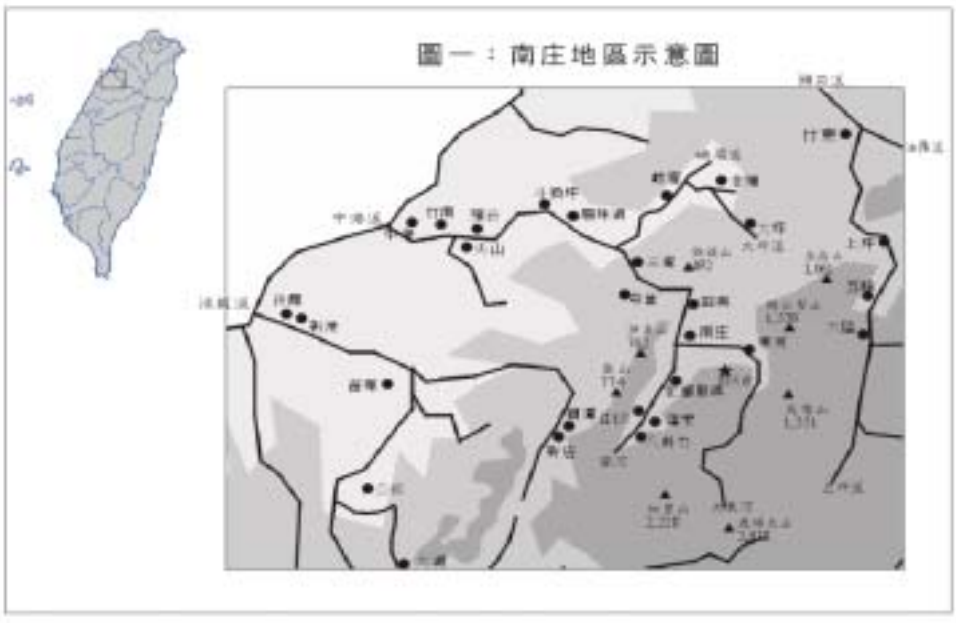
對於南庄地區歷史的研究，本文使用的史料主要是官方的檔案，包括《淡新檔案》、地方志、實錄、日本時代的調查報告；在私文書方面，則主要以契字古文書爲主。這些資料的性質主要爲地方官府的治理記錄及漢人開墾的土地交易資料，利用這些材料所建構出來的南庄地區原住民的歷史圖像，其實是「外人」眼中看到的原住民。這種歷史研究的視野基本上強調的是文字資料中所見到的原住民社會在外力衝擊下的改變，這和人類學家直接對沒有文字的原住民作調查研究，強調原住民社會本身由內部反應外來的影響，兩者所看到的東西是不同的。這類性質的歷史材料對於建構賽夏族的主體性，或者賽夏族社會的整體性，具有相當程度的困難。但是，不同族群之間的互動，或許正是促使「賽夏」人的群體意識和族群邊界逐漸固定下來的原因之一。因此，要了解南庄地區賽夏族社會的背景及轉變，不得不以漢人開發南庄地區所留下的歷史記錄開始談起。

南庄地區的「開發」，和其所屬流域中港溪的發展具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庄位在中港溪上游，中港溪沿途向西流經田美、三灣、珊珠湖、斗換坪、頭份、竹南等地出海，地形則由沿海平地向東方山區逐漸緩升，在南庄的高度約莫四百餘公尺左右。再往中港溪上游的大東河及南河上游走，則可高達海拔一千公尺以上。南庄則位在中港溪兩條支流南河及東河的交叉口，也可以說是出入南庄內山地區的門戶所在。沿著中港溪上游的大東河、南河，及南河支流小東河的河谷，則有零星的平坦地帶可供農作。現今南庄對外的交通，主要依賴公路運輸，最簡單的方式是沿著中港溪沿岸出入，此外，也可以從獅潭越過仙山沿南河到八卦力及蓬萊的方式，或從新竹五峰翻越山嶺從六隘寮一帶進入。對於早期慣於行走山路的原住民而言，因不受公路建設的限制而有更多山徑道路可供選擇。從地圖上可見，南庄是進出廣大東南山區與西部緩丘平原的交匯點。（參見圖一）

圖一：南庄地區示意圖



由於南庄的交通路線和中港溪有密切的關係，漢人的開墾也因此大多循著中港溪向內山方面前進。最早勉強與中港溪周邊有關的記錄，大概是十八世紀初江日昇的《臺灣外記》（1704）中曾提到在永曆十六年（1662），鄭成功實施「撫番」，各社置通事，徵收社餉；後龍、新港、竹塹等社受撫。永曆三十六年（1682；康熙二十一年），爲了防止清人犯臺，鄭克塽徵用「番力」輸送軍需，各社不論男女老幼均爲差役，致使耕種失時，引起反叛騷亂，竹塹、新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社亦參與。鄭氏令陳絳督兵撫剿反變「土番」；受撫者回原社居住，抗拒者則率領族人遁入山地。（江日昇 1704: 398）這則記錄在後來的方志中一再沿用，而且成爲中港、新港等社抗拒者潛入三灣，竹塹附近各社敗退至北埔、峨眉等地說法的緣起。雖然到目前爲止沒有可靠且直接的證據足以支持這樣的說法，但是地緣關係來看，可以合理地懷疑賽夏族和西部沿海平埔部落之間的原來有可能有一些關連性。

清代番界政策的開始，主要是在康熙末年朱一貴事件之後。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政府在全臺近山地區設立番界（黃叔璥 1957: 167-168）。番界政策的實施立意在於分隔漢番，企圖阻絕可能發生的糾紛，尤其是漢人對原住民土地的侵墾。當時臺灣北部仍隸屬於彰化縣，北臺灣最早正式設立地方行政機構是雍正元年（1723）設立淡水廳，雍正九年（1731）淡水廳海防捕盜同知才正式駐紮在竹塹（即新竹）（鄭用錫 1834）。在地方行政確立之前，番界的設立對於北臺灣的影響或許有限，但一些材料還是顯露出當時清朝政府在中港溪流域的活動。例如番界中的一塊界石在「合歡路頭」，據施添福教授的考證，應位在中港溪下游的頭份尖山一帶（施添福 1990: 62 註 11）。此外，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嚴禁差役藉端擾累碑記」也提到中港一帶番田，係在雍正年間墾闢，碑記中記載的眾番佃庄包括中港、田蓁庄、三座屋、流水潭、海口庄、東興庄及香山庄（何培夫 1998: 40–41）。可見至少在記錄中乾隆末年之前，中港溪下游一帶平原已經墾闢，但往東走的頭份近山一帶當時是否已經開墾，目前爲止無法斷言。但是，番界界石的設立可以證實早在康熙末年之前，中港溪下游的頭份一帶便被認爲是漢番出入的重要據點。

再往中港溪中游的珊珠湖和三灣一帶前進，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設立屯制、分撥埔地時，便有「芎蕉灣、內灣埔地及三灣埔埔地」，共五十九甲餘，分配做爲新港社屯丁的養贍埔地。[1] 內灣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立的番界界石所在頭份尖山的直線距離約只有七、八公里左右，從內灣再向三灣走，也不過五公里；這些地方被選作屯地，應該與其地理位置具有控制山區的出入應有重要的關係。番屯制度的設立（1790），雖是爲了因應林爽文事件而進行的，但其實相當程度地繼承了乾隆四十九年以來（1784）閩浙總督富綱下

1 出自番業主蕭瑞雲抄錄編輯（1896），《屯番魚鱗冊》，頁 19 及 28；本文件採自中央研究院古文契書資料庫，編號 f01–01–014；頁碼為資料庫所給影像編號。新港社屯丁五十二名，配有芎蕉灣埔地二十八甲二分、內灣埔地二十二甲三分六厘及三灣埔地八甲八分三厘二毛，共五十九甲餘；而中港社屯丁三十三名，則分配到塩水港埔地七十甲餘。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令進行的土地清丈事業；此次清查界外埔地的主要原因在於霄裡社武陵及馬陵埔一帶（現龍潭附近）的漢墾番業糾紛，清丈事業後來是否到達中港溪流域一帶並不清楚（臺案彙錄甲集：1；明清史料戊編：223a–225b）。但是，劃撥屯地及分撥埔地給熟番屯丁的地點，也可以作爲顯示當時土地開發程度的重要指標。在分撥給新港社屯丁的界外埔地中，內灣和三灣埔地是「未墾荒埔」，而芎蕉灣埔地是「無碍荒埔」，內灣、三灣都在中港溪中游，而芎蕉灣疑似在現在苗栗縣通霄鎮朝陽村，文中所提「無碍」指的是對什麼無碍，目前並不清楚，也或許可以解釋成沒有爭議的土地。雖然目前沒有記錄顯示新港社的原住民曾經在獲撥養贍埔地後，親自開墾中港溪中游內灣、三灣一帶；但這些用語顯示至少在這段期間內，番界以東不遠處可能已經有漢人的墾拓痕跡。

到了嘉慶二十一年（1816），中港社通事、番差、土目、甲首等人招漢佃承墾山豬湖一帶（即今珊珠湖一帶），同年也有漢佃向中港社通事（即前述人等），以及向新港社番屯丁首等承墾二灣、三灣、平潭、南北埔等地；此時期與新港社養贍埔地相關的契字有些留存至今（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 1963: 405-407、783-787）。其中一件與前述開墾珊珠湖相關的記錄出現在《淡新檔案》第一三二〇四案第一件，中港珊珠湖庄墾戶饒應惠（即饒榮光），於光緒八年（1882）稟請新竹知縣准予出示勘丈陞科、完納課賦，文件中提到嘉慶二十五年(1820)其父向中港社社番給墾珊珠湖老崎青山地方。雖然在時間上有些出入，但大體上可以顯示在三灣到田尾一帶河谷，亦即中港溪由南向北流經田美後向左轉折，到三灣再向右（即朝北方向）轉折的兩個大轉彎之間的地帶，至少在十九世紀初期的嘉慶年間已有漢人陸續開墾。不過，至此時期爲止，文獻中出現的原住民大體上都還是西部平原的原住民（「熟番」）。

至於在更上游南庄地區的開墾，則不得不提到黃祈英家族的發展。據說是黃祈英在嘉慶十餘年（1805 後）進入斗換坪，除了擔任「番割」進行與原住民之間的物品交換貿易外，還和原住民頭目樟加禮結交，並娶其女，還擁有一個番名「斗阿乃」，所以亦名「黃斗乃」。據黃祈英的曾孫黃鍊石的描述，南庄地區開發之始，乃黃祈英邀他的朋友張大滿、張細滿（即張有淮之曾祖，張有[幼]淮是清末南庄著名土目之一）一同進入南庄田美一帶開墾。[2] 黃祈英的故

2 黃鍊石為黃祈英曾孫，曾於 1899 年獲頒紳章，最高曾任新竹辦務署第二十二區街長。本文件確實書寫年代不詳，但據其自署名為田尾南庄村長來看，應在 1896 年後。引自黃煉(鍊)石著、伊能嘉矩抄錄，〈奉查南庄開闢緣由序〉，收於臺灣大學藏伊能文庫「臺灣地理資料：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鳳山、恆春」，微捲編號 T0021/58。黃鍊石履歷則參考鷹取田一郎執筆，《臺灣烈紳傳》（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鮮明地說明漢人和原住民之間的可能互動景象。而這裡提到的原住民，便是今日賽夏族的祖先。

黃祈英的事業後來因爲捲入道光六年（1826）年四、五月間發生在彰化的分類械鬥而一蹶不振。黃祈英等「內山著名番割」被指控窩藏在淡水廳內的匪徒，而且「率令生番出山助鬥」，因此在清軍指揮下籠絡通番語的蔡小滿，給發賞格，讓他傳諭「番眾」將「內山匪徒縛獻」，因此有消息通報黃祈英等十餘人當時藏匿在都立口（即都壢口，接近田尾）。黃祈英等被逮捕之後處以凌遲梟斬之刑（孫爾準 1987: 688, 699–700）。《宣宗實錄》中記載清政府處置這次事件的方式，主要是派撥六十名熟番屯丁駐紮大北埔（位於三灣東南方，今小北埔東），設立屯弁防守。該地的民墾荒埔，則酌科租穀撥充屯丁口糧，黃斗乃開墾的五甲埔地亦充歸屯弁耕種，其他各犯開墾之番地則還歸番有，另外選定正副通事、土目負責在隘口進行漢番之間的交易（清宣宗實錄選輯 1964：53-54；孫爾準 1987：708）。另外在中港溪中游增設汛防，將鎮標左營調撥外委一員及步戰兵四十名移駐斗換坪，歸北路右營遊擊管轄（孫爾準 1987：377）。

三灣屯的設立，是閩浙總督孫爾準爲處置黃祈英事件決定的善後措施之一，其目的主要在於徹底地控制中港溪上下游之間的交通、及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貿易。此次事件除了充份顯露出清廷對於易於窩藏盜匪的「內山」地區的顧慮，尤其對介於漢人和生番之間的「番割」不信任，其考量或許如其所宣稱乃顧慮此類人等將會成爲擾亂番社秩序的禍源；又或許是成爲漢人源源不絕進入山區的仲介；更甚者，他們可能是提供番社違禁武器的來源，一旦原住民和邊區開墾的漢人發生衝突時，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尤其在番割往往擁有生番奧援的狀況下，番割可能是實際上開墾邊區地帶的領袖之一，不但具有影響各開墾勢力分布的能力，更對清政府控制邊區的努力來說，無疑是一項威脅。但是，在全臺設屯近四十年後，孫爾準仍然想要藉由設屯的方式，控制漢番交界隘口的秩序；雖然將番界的位置由頭份移向上游三灣一帶，卻仍然只是墨守成規。現今三灣地區仍留有「屯營」的地名，在三灣以南約兩公里處；回顧前述嘉慶二十一年（1816）漢佃向新港社及中港社番請墾三灣以東番地及養贍埔地的開墾歷史，可知三灣屯的設置，只是在已經不甚穩固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番屯制基礎上，試圖稍微補強而已。據同治十年（1871）《淡水廳志》的記載，在道光六年以後三灣設有一隘，此時的記錄顯示隘丁有四十二

北：臺灣總督府，1916 年），頁 146–1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名，屯把總仍然照舊（淡水廳志 1963: 47-48）。可見至少在一八七〇年代之前，三灣屯的經營僅剩一名把總，實際上則轉變成墾隘，後來成爲漢人開墾，尤其是清廷亟欲禁絕的黃家勢力進入山區的管道之一。

在竹塹城方面，當地士紳在道光六年倡議捐建石城，以及後來金廣福的成立，主要的考慮之一也是爲了整頓竹塹城東南方面的安全。這些事件，應該和道光六年的閩粵械鬥有一定的關係。[3] 道光六年時清政府對黃祈英事件的處置，主要希望藉由設立屯兵駐守，控制漢番之間私下進行物品及土地租賟、胎典等交易。但是黃祈英家族在南庄的勢力卻沒有因此而完全被掃除，主要是因爲他的兩個兒子允明和允連，藉著充當三灣屯社丁的方式在道光十二年（1832）得以繼續往南庄開墾。前述閩浙總督孫爾準的奏摺中提到黃祈英「所娶番婦已身故，無子、亦無財產，其私開荒埔係在界外，毋庸斷給死者之家」（孫爾準 1987: 706）；顯然係黃祈英家屬採用計法逃過了此一生死劫難，陳運棟先生用黃家公廳祖公牌位及相關史料等排出黃家系譜，充份顯示出黃祈英的兒子們不僅安好，而且在不久之後便展開他們的土地開墾事業（陳運棟 1997）。

黃允明、黃允連用墾底銀一百元的代價，在當地墾戶張肇基的建議之下，以承充「社丁」之名，向竹日武三屯把總向仁鎰取得開墾都壢口沿河一帶的「永給墾批」權，據該契的描述，開墾的範圍北至獅頭山、南到西（獅）里興一帶，可說在 1830 年代便把南庄地區的主要部份，即獅頭山－田美－南庄－獅里興此一沿河地帶歸入其墾拓範圍內了（三田裕次 1988: 54）。這個時代其實也是整個新竹地區的墾隘大量設立的時期，但在三灣，他們不用設隘爲名，而是以道光六年以來設立的三灣屯的名義來取得開墾權利。到了光緒十四年（1888）該契投稅時，契尾中記載「業戶黃允明、黃允連買向仁鎰埔地一所」。黃家的勢力不僅在這半世紀中在南庄地區落地生根，更可見證屯墾制度的式微過程。進入道光朝之後，歷史記載中南庄地區的開發便與當地生番有所

3 據道光六年（1826）十一月來臺處理械鬥善後事宜的閩浙總督孫爾準奏摺云，除臺灣（即現在臺南）及嘉義舊有磚城之外，道光四年巡臺之際便曾親勘驗收彰化磚城及噶瑪蘭土城竹圍，而次年（道光五年，1825）七月鳳山縣的石城也開始興工，惟有淡水廳僅係原有土城，奏摺中提到：「現據該處紳士林平候、林萬生等呈請照鳳山縣之例損資建造磚城，並捐番銀三萬圓，以為眾倡，臣查淡水塹城庫藏監獄皆在其內，自應建築磚城以資保障....」。淡水廳石城的建設在當時全臺各城中是最晚的，若非道光六年械鬥案的發生，以及淡水廳士紳的倡捐，或許淡水廳石城的建築本不在清朝政府的興修名單之列。孫爾準，《孫文靖公奏牘稿本》（約成書於 1831），（北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頁 287–289。

國立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接觸，但大多還只是模糊地提及「內山生番」等。但黃祈英的故事具體地說明早在官府及屯墾勢力介入之前，原住民和漢人之間早已有貿易、通婚等行爲。

四、清末「開山撫番」與樟腦事業的影響

接下來一波漢人向南庄的開墾，是在清末進行「開山撫番」時期。進入光緒朝（1875–）之後，一方面由於臺灣在清朝整體國防地位的轉變，清政府爲積極宣示番地主權及爭取番地資源來支援臺灣防務經費，而進行全臺的「開山撫番」，另一方面也由於內山出產的樟腦資源，吸引了更多漢人以「招撫生番」之名，進入番地開墾製腦。因爲開山撫番而進入南庄地區的清政府相關人員的數目，或許可以參考伊能嘉矩提供的一項數據。伊能在明治三十年（1897）訪問南庄，並前往南庄撫墾署收集資料，提到南庄在清末（光緒十八年[1892]三月二十日）設有南庄撫墾分局，由史德寬擔任委員，另外還有兩名吏員及百名勇丁。相較他於五年後，在 1897 年當時調查的南庄人口數 323 人、戶數 91，便占有三分之一強，不可謂不多（伊能嘉矩 1996: 101-102）。以上所提還只是清政府派駐南庄地區的兵勇數目，如果再加上進入開墾與製腦的漢人，可以想見對清末南庄地區當地原住民社會的衝擊必然十分巨大。

《淡新檔案》中有幾件與南庄地區相關的案件，可以用來說明在開山撫番時期當地原住民社會、地方官府、開山撫番軍隊以及製腦開墾的漢人之間的關係。[4] 其中一件提到的案子提到陳禎祥（即金將興，後壠網紘仔莊人，具軍功六品）於光緒七年（1881）向新竹縣知縣稟告，早在光緒元年（1875）即曾「招得西里興等社拾餘社及番目拾餘人等到城薙髮歸化在案」（淡新檔案：17322.1）。陳禎祥的目的在於開墾該地荒埔，隨後附稟貼有一張光緒六年（1880）獅里興社及獅頭驛社番目等交付陳禎祥開墾該社埔地的地契爲據，以及一紙竹塹城舖戶的保結狀（淡新檔案: 17322.4, 5）。然而，在訴訟進行的當時（光緒八年 1882），新竹縣知縣提到社番給陳禎祥所墾獅里興等社荒埔，在某前任淡水廳同知任內便有金成福及金萬成（黃南球）兩墾號爭控西潭底山埔之舊案；此一舊案亦牽控陳禎祥，當時的淡水同知便以此爲由並未核准，而當任知縣亦以慎重起見，不想「招番爲名、啓爭墾地之實」；尤其「獅里興荒埔，

4 《淡新檔案》是清代淡水廳及新竹縣的公文檔案，涵蓋的年代自 1812 至 1895 年間，共有 1,143 案。見吳善祖，〈清代「淡新檔案」——臺大圖書館的新特藏〉，《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 40 期，1987 年 6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與西潭底地名互異，寔則界址毗連，誠恐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可不可先爲之防，只好從緩再辦」；因而駁回陳禎祥以「招番爲名」准其開墾的訴求（淡新檔案: 17322.6, 7）。

由前述案例可見，南庄番地的開墾，大約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發生後，以欽差之銜來台督辦防務的沈葆楨開始進行「開山撫番」之時，便有以「招撫生番」爲名義在番地進行開墾之實。此處所謂光緒元年招撫的源頭，羅大春的《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中提供了線索，羅大春是在沈葆楨來臺進行整頓防務時，在臺灣北部及東部進行開山撫番的主要負責人，在沈葆楨招民開墾以助邊防的政策下，他提到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十三日淡水紳士李清琳稟以桶後六社生番歸化，十四日，「曾捷春復以淡水西潭底、下樓等社男女番四百餘人名籍來，余以鞭長莫及，飭歸淡水廳受而遣之。」（羅大春 1972 [1874–1875]: 27）。這裡所提的雖然是西潭（即苗栗獅潭）一帶，但和南庄內山獅里興地區其實只有一山之隔，如光緒八年新竹知縣所說，兩者地名或有異，但關係著實密切。羅大春所描述的語氣充份傳達當地士紳看似「熱烈響應」的複雜反應。

簡而言之，上述《淡新檔案》一案，是目前可見的文獻記錄中，首次出現南庄地區的生番社--「獅里興」及「獅頭驛」等社名；前面所提到的契約，也是首次以南庄地區原住民爲主體和漢人簽訂的契約。而契約中出現的原住民名字--馬祿頭、鞋底、踏尾、猫合、蛙哨、色溫、加礼--此時還是漢字音譯式。漢人和南庄地區生番社之間的關係，因爲開山撫番後開墾的加速進行而更形緊張，在一件光緒十一年底至十二年初（1886）的案件中，新竹總墾戶黃南球屢次向新竹知縣稟報獅（西）里興（英）生番在獅潭一帶殺害佃人的事件。黃南球提到獅潭等處乃其備資承墾、設隘防番，但在撫番爲重的政策下，奉諭不准殺番，遂稟請新竹知縣下令禁止地方民人接濟生番刀銃鉛藥等（淡新檔案: 17107 案）。除了可以側面觀察當時在原住民番社之間火藥、武器的流通狀況外，對獅里興社生番而言，他們和漢人之間的關係，既有合作、也有拮抗，或許也可以說明在面對漢人開墾勢力時，不見得是毫無選擇餘地的。

另外一個案件，則始於光緒十三年（1887）八月，魏慶燾代其父魏啓陞（後龍釐金局職員）向新竹縣衙門控告陳禎祥走私樟腦、偷漏釐金，並勾帶生番強擄魏啓陞的案件。次月，南庄獅里興社的土目日阿拐、絲有眉等人反向負責開山撫番的統領臺北隘勇營都司鄭有勤投訴魏啓陞強擄二名化番，鄭有勤遂移文給新竹縣知縣，要求其查辦魏啓陞是否擄番。日阿拐等人陳訴他們和陳禎祥合煎樟栲三十五擔，交給陳禎祥赴臺北發售，所得經費作爲社番口糧，卻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魏啓陞等人藉偷漏爲題搶掠一空。此案演變成雙方人馬互告的局面。次年（1888 年）十月陳禎祥被逮捕後，案情便宣告終結（淡新檔案: 32611 案）。但是，案件中許多問題仍然懸而未決，被擄化番一案並查無實情，陳禎祥也並未認罪。在當時以開山撫番爲重的氣氛下，番人社會的和平成爲考量的最高標準。這一個案子雖主要是因樟腦糾紛而生，卻可以看出除了原住民本身也參加樟腦的生產，與原住民勢力合作的漢人，往往藉「招撫生番」的名義，不但得以進入生番地界開墾與採製樟腦，也在開山撫番的運動之下，獲得了合法性。而南庄地區的原住民在清末這一波開墾及樟腦製造的風潮中，其實也有所獲益。前述日阿拐即以向漢人製腦者收取以腦灶數支給的「山工銀」致富，同時雇有漢佃數十名開墾水田（理蕃誌稿 1989 [1918]:175-176）。另外，也有大嵙崁撫墾總局在光緒十八年（1892）給發墾單的諭示中，提到獅里興社土目絲大尾：「查該土目歸化有年，能諳耕作，督率番丁開有成田，深堪嘉尚...」（台灣私法物權編:191）。這些記錄挑戰了向來認定原住民在漢人侵墾的壓迫下必然是弱勢貧乏、無法自給更生的論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幾個案件中，出現的南庄地區原住民已經開始使用漢式的姓名，像日阿拐、絲有眉、絲大尾等。漢式姓名的使用，在與漢人及地方官府接觸更爲頻繁時，次數明顯大幅增加。從光緒六年到十三年（1880-1887）的八年之間，原住民名字的變化，不但突顯出這段期間的關鍵性，更說明在原住民與漢人及清官府在接觸之後可能產生的社會內部轉變。即使不是社會本質的質變，至少也代表該地區原住民在面對外來衝擊時傳達出某種「服膺王化」的意象。

這些原住民之中，據史料記載，日阿拐生於道光二十年（1840），父母原是閩南人，被賣給熟番日有來爲子，後來成爲南獅里興社的土目。光緒十三年（1887 年），經由前述之統帶臺北隘勇等營都司鄭有勤的居中引介，日阿拐被封爲「社長」（每月領有口糧，需至地方衙門述職），具有合法的番社領導權，還領有六品軍功。（三臺雜誌社採訪組 1994: 56）他的發跡或許可以說是和開山撫番勢力合作之下的產物。日阿拐在光緒十八年（1892）便向大嵙崁撫墾總局領有墾照，他的墾區稱爲「聯興庄」（波越重之 1985 [1907]:187）。

清末北臺山區的開墾，目的主要是爲了取得樟腦資源。明治三十年六月十二日（1897），伊能嘉矩從竹東往北埔大南坑方向視察的時候，看到在蕃地內設立的漢人腦寮，他描述腦寮的數量極多並和蕃社相望。而其中十之六、七是未經官署許可而私設的。伊能還特別注意到當地的非法濫伐，使得腦寮附近的山嶺都已禿濯，不只樟樹被砍伐，連其他木材也被砍作薪材，伊能認爲對於將來的林業經營將造成極大的傷害（伊能 1996: 86）。六月廿四日他到南庄地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也到獅里興社(Sairihen 社)去訪問並參觀頭目 Tavoi 的家，他記錄到頭目平時務農，也兼做製腦工作；頭目家的規模很大，屋內已有掛鐘及洋式油燈照明，另外還張貼有漢人的「守符」。[5] 次日，伊能再到獅頭驛參觀頭目 Yuwai（有淮）的家，他記錄頭目雖然留著蕃式散髮，但身上穿著漢衫，操流利漢語，從事製腦業，並雇有一名漢人書記協助他的事業（伊能 1996: 102-103）。根據這項描述，南庄地區蕃社的頭目的勢力、財富、生活方式等都和《淡新檔案》及其他文獻資料中得到的結論相符。

到了日本統治時代，位於蕃界內的樟腦製造業者，對於土地的使用權和所有權的疑義，或許是造成南庄事件的原因。「南庄事件」發生於明治三十五年七月（1902），就是以日阿拐爲首，率領附近地區原住民抗日的事件。主要原因是日阿拐不滿在山場開墾的製腦者怠付山工銀，因此聯合原住民攻擊南庄支廳（理蕃誌稿 1989 [1918]: 175-176）。製腦業者之所以不再向原住民繳納山工銀，亦即依據所熬樟腦灶數所給的和蕃權利金，可能是認爲在日本統治態勢穩固後，製腦者已經不需要向賽夏族人取得開墾蕃地，即「國有地」的承諾了（林欣宜 1999: 130-131）。南庄事件後，隨著隘勇線的前進，及因南庄事件後廢耕的田園復耕，日阿拐原有八十八甲既墾地被沒收，於明治三十七年一月（1904）編入普通行政區，二月時，再依臺灣總督府指示，把竹南一保北獅里興社、獅頭驛社等地，以遺漏的「舊普通行政區」名義追補編入，編入地籍時不再以「社」、而改以普通行政的「街庄」爲單位（理蕃誌稿 1898 [1918]: 333-336）。

從以上清代南庄地區的開發歷史來觀察，可以見到原本原住民的土地利用形態，在經過漢人開墾、製腦的勢力及國家軍隊進入後，隨著蕃地屬性的界定，以及國家勢力對蕃地的逐步掌握，因此也相對地使得原本原住民的土地使用權利或所有權利的概念，產生了極大的衝擊。這個過程隨著清末開山撫番到日本殖民政府開發蕃地延續地發展，也更加強化。在此區生活的原住民，也隨之不斷面臨新的競爭挑戰和資源條件的變化。

五、「賽夏」分類定名與群體意識的變化

目前所界定的賽夏族，主要聚落分佈在新竹縣五峰鄉、苗栗縣南庄鄉和獅

5 伊能所記的獅里興社頭目 Tavoi，從名字發音可以推測應該就是當時北獅里興社著名的頭名絲大尾（tapoeh'）。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潭鄉一帶淺山地區。[6] 這一群原住民，1906 年日本總督府進行戶口統計時，人口不到 800 人，僅佔當時原住民人口比例的 0.65%；至 2001 年，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統計，賽夏人口約 4761 人，也僅佔原住民總人口的 1.1%。[7] 雖然，在近一百年來的資料記錄中，賽夏族一直是人數很少的小群體；不過，他們的語言、社會組織、宗教祭儀、和神話傳說等，卻一直保有可與周邊其他族群相互區辨的獨特性。這樣的現象，對比十九世紀以來南庄地區複雜發展變化的政治經濟情境，促使賽夏人很早開始與主流社會密切互動而不斷改變生活形態，如擔任隘丁、經營樟腦事業、種稻種茶、開採煤礦、林場伐木、經濟作物生產、和近年的民宿觀光經營等，顯得相當特殊。尤其自日本時代起，基於山地開發、管理等原因，賽夏聚落分佈範圍就被國家勢力切割爲二半，分別劃在「平地普通行政區」或「山地特別行政區」二類不同的行政版圖中。五峰一帶屬於山地區，南庄、獅潭一帶屬於平地區；而二區的賽夏人在官方戶口登記中，也隨著居住地點的不同，而被曖昧地夾在「生番」 /「熟番」、「山地山胞 」/「 平地山胞」、或「山地原住民」 /「 平地原住民」二類之間。雖然，對應於這條外來的行政分割線，賽夏社群內部也有「南」、「北」二群的區辨概念：南庄、獅潭一帶是「南群」；五峰一帶是「北群」。但是，南北二群的語言和文化特性卻沒有明顯的差異；二群間仍然密切互動往來，不同姓氏家族間相互通婚、共同參與或舉行儀式；同時，彼此相互認定同屬一個群體，也都認同使用「賽夏」（『*saissiat*』）一詞做爲共有的族群集合名稱 [8]。

不過，在歷史文獻材料和早期民族學研究者的分類概念中，南庄地區賽夏族群分類定位和命名的問題，卻相當混淆而有爭議性。例如，1895 年起到臺灣進行臺灣原住民調查研究的先驅者，如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和森丑之助等人，都未將這一群體視爲原住民分類中的一個獨立部族。可能受到清代文獻材料，尤其最早在江日昇 1704 年記錄的影響，南庄四周山區居住的這一小群原住民被認爲是「未漢化」的平埔族，屬於西海岸道卡斯群（Taokas）的一支。雖然研究者也注意到這一群原住民的文化習俗與平埔族有所不同；不過他們提出的解釋，有時認爲是與深山地區「泰雅族」同化的結果，有時則說是保留過

6 目前賽夏大約還有半數人口居住在這個區域；另外估計有半數遷移到外縣市，或是鄰近的城鎮中居住；參考林修澈 2000：308。

7 原住民人口，又僅佔全臺灣人口比例的 1.2%。參考原民會網頁 http://www.apc.gov.tw。

8 相對於這個名稱，他們稱呼泰雅族人為『*saipapas*』、客家人為『*moto*』、閩南人為『*kamsiulang*』、外省人為『*babui*』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去未漢化前平埔族一些固有「土俗」的現象（伊能、粟野 1900: 101；伊能 1904: 136）。

早期文獻材料主要使用「南庄化番」一詞指涉現今界定的「賽夏族」。在《淡新檔案》材料中，可以見到不少有關南庄化番的社名和姓名記錄。這種記錄方式，到日本統治初期也類似；如最早於 1896 年到南庄調查林況的總督府技師西田又二和伊能嘉矩等，都在記錄中使用「南庄化番」做爲指稱名詞。[9] 除此之外，「合番」也是史料記錄中曾用來指稱賽夏族的名詞。例如，《新竹縣采訪冊》（1894）提到「在縣東南一路竹塹堡五指山一帶各社，並延及竹南堡獅裏興一帶各社，番共有十餘姓，……，皆同一種類，俗皆統名謂之『合番子』，話皆相同」（陳朝龍 1999[1894]：403）。日本時代新竹支廳調查（新竹地方看察報告抄錄，收入伊能文庫）也提到南庄地區左側，獅潭附近的馬陵、坑頭、崩山下三社被稱爲「合番」。[10] 「合番」一詞與現在「賽夏族」分佈範圍的關係，從 1722 年設立番界時提到的「合歡路頭」（現頭份鎮尖山里附近）也可以推測；由於「合歡路頭」的位置具有控制中港溪下游出入內山的地位，此地很有可能便是指「合番」（閩南語發音）出入移動的隘口。[11]

日本時代開始引入民族學方法有系統地調查原住民，但伊能嘉矩等人最初提出臺灣原住民分類命名系統時，並未採用『*saissiat*』（賽夏）一詞做爲族群名稱。伊能嘉矩在不同時期的記錄中，對南庄四周山地這一群原住民變換過三種不同稱呼：（1）1897 年的踏查日記中，伊能稱他們爲「*Sumiyal*」（森口雄稔編 1992：22、楊南郡譯 1996：96）。（2）1899 年和 1900 年的資料則記載這一小群人自稱『*Amutoura*』」[12]（伊能 1899 年；伊能、粟野 1900：101）。（3）1904 年伊能在《臺灣蕃政志》中，卻突然開始大量使用現今大家熟悉的

9 技師西田又二，〈新竹縣南庄地方林況〉，收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報文》第一卷第二月（東京：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1986 年）。

10 不著撰人，〈熟蕃　合蕃〉，收入臺大「伊能文庫」中「臺灣地理資料：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鳳山、恆春」。

11 2002 年 12 月在本計畫座談會口頭報告時，受到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施添福教授提醒。參考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臺灣風物》第 40 卷第 4 期，1990 年 12 月。

12 「Sumiyal」一詞的意涵來源不確定。但「Amotoura」一詞，根據土田滋先生從語言學的語詞分析，可能是「將要變成客家人了」的那群人；「moto」是賽夏人對「客家人」的稱呼，字首和字尾是變化詞。這個說法有幾點十分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很明顯地指出這群人「客家化」的現象十分嚴重，其次，似乎隱含當時的受訪者區分自己和那群「快要客家化的人」為不同的一群人。

國立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iasiett*』（「賽夏」）一詞稱呼「南庄化番」，並提到『*Siasiett*』是此部族的'自稱'（伊能 1904: 310）。不過，對於爲何一再改變此部族的名稱，伊能卻從未加以解釋。[13]

總之，「*Siasiett*」（賽夏）一詞，在 1911 年總督府出版的 *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 中，才正式被官方公佈爲臺灣原住民一族的族名。自此之後，*Siasiett* 便以「賽夏族」這個名稱或相近的音譯名稱（如獅設族）在記錄資料中出現並沿用迄今。不過，有關賽夏族群是否是平埔族道卡斯部族一支的爭議並未中斷，直到 1935 年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等出版《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進行語言、系譜、遷移傳說、社會組織、和祭儀特性等實地調查材料的綜合分析比較之後，分佈在新竹、苗栗交界淺山地區的「賽夏族」（*Saisiett*），做爲獨立一族的說法大家才不再有異議。

『*Saisiett*』固定成爲官方分類體系中原住民的族名，雖然是日本學者展開民族學調查研究的結果；但『*Saisiett*』這個名詞的使用，卻不是伊能嘉矩的創造和發明。清末時期 1894 年刊印的《新竹縣采訪冊》中，已採錄了當時新竹縣境內「合番子番話」，有關日月星辰、身體部位和姓氏名稱等詞彙，這些詞彙以閩南話發音漢字書寫，許多都與現今賽夏語詞彙相吻合；其中一段「人物稱謂類」提到：「後山番自謂番曰西絲臘，後山謂淺山番曰謂謂欲，淺山番為後山番曰一打孽」。[14]「西絲臘」應該就是後來羅馬拼音記錄的『*Saisiett*』。這本采訪冊雖然不是有系統的民族學記錄，目前也無法理解當時資料採集者所界定的「淺山番」與「後山番」界線爲何；但至少從中可知「西絲臘」早已是「合番子番話」中某一群人的自稱；同時，也反映出清代「番界線」之外的原住民部落間也有其共同認知的群體意識存在，只是這樣的群體意識或界線隨著時間環境變化而流動或延伸，並非截然固定的。

有趣的是，『*Saisiett*』一詞首次被伊能嘉矩採用做爲南庄地區的部族自稱，是在 1904 年；其時間脈絡與特殊事件的發生有巧合性的關聯。前面提到 1902 年 7 月南庄地區南獅里興社日阿拐(*Akuai a Yumao*)因爲樟腦糾紛與日本統治者發生衝突（即前述『南庄事件』），一直延續至 1902 年 12 月才大致平定。

13 本書中，伊能仍然認為台灣原住民在人類學上的分類，分為八族：Taiyal（泰雅）、Vonum（布農）、Tso'o（鄒）、Tsarisen（查利先）、Paiwan（排灣）、Pyuma（卑南）、Amis（阿美）、Peipo（平埔）；伊能 1904：2）。其中，Saiseitt（賽夏）屬於平埔的一支。另外，紅頭嶼的原住民因為在台灣島之外，所以未被放入。

14 參考陳朝龍著、林文龍點校 1999：4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伊能曾在 1902 年 12 月到苗栗協調山地事務；1904 年 8 月陪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和參事官持地六三郎等官員巡視山地，又再進入南庄山區。[16] 雖然一反常態地，伊能對這二次旅行的目的和過程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我們無法得知爲何『*Saisiett*』這個名稱突然在此時被伊能辨識出來做爲部族名稱。不過，時間的巧合，隱約顯露出『*Saisiett*』族群意識的凸顯強化，可能與這一段期間外在政治經濟情勢的激烈變化有關。尤其 1902 年南庄日阿拐衝突事件發生不久後，1906 年又發生新竹五指山附近賽夏大隘社頭目 *Taro a Umao*（趙明政）率眾與日本警察衝突事件（文獻記錄中稱爲『北埔事件』）。雖然對於這二次事件，賽夏人不同版本的回憶論述，都不認爲這是族群刻意聯合與統治者對抗的行動；但其結果確實引發了統治當局對當地的攻擊，也牽連造成不少賽夏人的傷亡。因此，是否在一連串與官方激烈衝突和妥協過程中，一方面促使外界對南庄地方原住民社群瞭解和區辨能力增加？或者，另一方面，此地原住民本身也因爲一連串外來的糾紛和壓力，而更清晰、具體地凝聚和表現出其群體意識？這些都是值得再深入考慮的問題。總之，這二次衝突，不但是歷史文獻材料中記錄的重點，同時也是賽夏長老們對日本時代回憶的焦點話題之一。

六、人群流動模式與聚落性質

人群和聚落的移動，無疑是造成族群邊界變動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在口語傳說中，賽夏人的遷移歷史和居住地域曾歷經大規模異動變化。賽夏起源傳說不但描述賽夏人從起源地「*oppeoh-na-boon*」山頂往平地擴散遷移的經歷，也賦予了賽夏「*sinrayho*」（姓氏）起始的神聖定位。[17] 不過，對於可追憶的祖先遷移過程，現今大多以各姓氏家族爲單位，分別追溯從西部海岸邊向東遷移進入山區現居地的不同路線。雖然記憶中人群或聚落移動的確切時間

15 參考陳金田譯 1997：200。

16 參見江田明彥編 1998：96；陳金田譯 1997：306。

17 賽夏洪水起源傳說中，描述古代洪水氾濫世界變為汪洋一片，悻存的二兄妹者躲進織布機的經卷裡，漂到 *oppenhen-a-boon* 山頂。妹妹不久死去，哥哥將屍體切成肉塊，到水中就化成人，哥哥將肉塊變成的人拉到岸上，一一給他們不同的姓，共得到豆、風、鐘、士、高、蟹、錢、夏等姓；見佐山融吉、大西吉壽 1923：179-180。另外，還有類似情節的故事，提到將人切成小塊丟進水裡後；肉變成賽夏族，骨變成泰雅族，內臟變成漢人；相關記錄見伊能嘉矩 1908：219-224；小島由道 1917：；移川子之藏 1936：100-102。筆者進行田野調查期間，仍經常聽見老人家，講述不同版本，但類似情節的賽夏和賽夏姓氏起源故事。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地點，隨著不同描述者的記憶力和重點的差異而有出入；但「遷移」確實是賽夏人對於過去家族歷史描述時的一項重要主題。然而，究竟哪些不同動力或因素促使遷移？或是，這些人以何種型式進行移動？遷移的方式是否可以反映出賽夏聚落特性，或造成聚落性質的變化？這些議題卻還有待更細膩、更多跨時性資料的綜合分析比較和討論。

就目前狀況而言，賽夏聚落分佈範圍主要包括三大區域：（1）新竹頭前溪上游上坪溪流域，現今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和花園等地，屬於「北群」聚落；（2）苗栗中港溪上游東河（又稱大東河）與南河（又稱小東河）流域，現今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南江村、東村、西村和蓬萊村等地；（3）苗栗後龍溪上游獅潭川（又稱紙湖溪）流域，現今苗栗縣獅潭鄉百壽村和永興村等地；後二區屬於「南群」聚居地（參見圖一）。目前這些聚落大多由不同姓氏的賽夏族人共同聚居；一個聚落少者居住有一、二個不同姓氏，如十八兒、比來、向天湖、長崎、百壽等地；多者則有九、十個不同姓氏，如五峰、東河、南江、大屋坑、紅毛館、八卦力等地。此外，聚落中普遍有客家人、泰雅人或其他族群夾雜居住；即使在賽夏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南庄鄉東河與蓬萊等地，賽夏人口的比例也僅超過 50%而已。[18]

現今賽夏聚落的分佈範圍，根據賽夏口語傳說，大約是三百多年前左右開始陸續遷移至此定居。此領域範圍，自日本時代進行族群聚落調查和區域地圖繪製起，變動並不太大。不過，若是對照比較不同階段有關本區原住民的聚落資料記錄，可以發現不同時期記錄者對原住民的認知觀點、以及賽夏「社」名和聚落性質的一些變化訊息。目前可知日本統治臺灣後最早提到有關南庄地區「蕃社」的記錄，應該是日本技師西田又二的調查報告（1896）。他在報告中列出南庄地方原住民有八社，其中「化蕃」有七社，而「語言習俗不同」的「高山番」則有一社。對於這二類原住民的聚落，記錄中的社名型式也有差別：「化蕃」聚落主要是以地名加上社長（或族長）的漢式姓名組合而成，如「獅里興小東河尾日阿拐社」、「獅里興絲大尾社」、「大東河鵝公髻山下樟阿斗社」等；而「高山番」的社名則是僅以地名表示，如「鹿場口蕃社」（西田 1896: 325-26）（見表一）。換言之，「化番」的社名附加有姓名標示，而「高山番」社名則無姓名標示。

二十世紀初始，伊能與栗野在《臺灣蕃人事情》（1900 年）中較詳細地記載當時「南庄附近未漢化族群」（化番）共有九社：獅里興社、獅里興口社、獅

18 陳淑萍 1999：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頭驛社、番婆石社、鵝公鵠山腳社、加禮山腳社、五分八後社、梅子坪社[19]、新店坪社等（見表一）。同時，他提到這九社實際上是由 24 個小社組成，總計人口約有 881 人。在記錄中，伊能和栗野雖然以地名做爲社名；不過他們特別強調其中許多「社」，如獅里興社、獅里興口社、獅頭驛社等，實際上涵蓋了許多個分散的小社；每一小社平均人口約 36.7 人、平均戶數 6.3 戶；每一戶平均 6.7 人（伊能、栗野 1900: 102、103）。

小島由道 1917 年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中，明確地以「賽夏族」爲調查對象，描述其分佈和種族沿革。[20] 書中提到賽夏族由十一社構成：*Sipazi:*（十八兒社）、 *pilay*（比來社）、大隘社、橫屏背社、大東河社、獅頭驛社、南獅里興社、北獅里興社、崩山下社、馬陵社、和坑頭社；人口總數約爲 1，265 人。這些社基於共同舉行 *paS-ta'ai*（矮靈祭）祭祀和共同流域防禦等原因，聯合爲北賽夏（前三社）和南賽夏（後八社）二群（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8：5-7）。小島的記錄更清晰地反映出當時賽夏聚落的一些基本性質：（1）許多「社」由數個分散的小聚落組成；如「大隘社」由加里山 (‘isa'sa')、四十二份 (*baboLsan*)、籐坪 (*‘ilmok*)、一百端 (*rakeS*)、和(煉)簑坪(*ray'in*)等五個部落形成；「大東河社」由 *siwazay* 和*'a'owi* 二個部落形成；「橫屏背社」由*'amisi'*和 *morok* 二個部落形成；獅頭驛社由 *garawan*、*raromowan* 和 *wazwaz* 三個小聚落形成。（2）記錄中以漢式地名標示的社名經常是集合名詞，而不是實際居住的自然聚落；實際居住自然聚落戶數很少超過十戶，而且都有賽夏語名稱，許多小聚落甚至沒有漢名，因而只能以拼音方式記錄。（3）北賽夏聚落有較多不同姓氏共居；而南賽夏聚落還是一或二個姓氏集居於一個小聚落。除了戶數很少的姓氏之外，通常各姓在不同部落都有自己的族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8: 135-137）。[21]

19 這個社所指究竟何處，目前還無法確定。

20 本書是「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蕃族科」以官方力量大規模分族進行調查的結果。是最早試圖涵蓋全面性社會文化項目記錄的賽夏民族誌。參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譯，1998。

21 例如，北賽夏的加里山部落(‘isa'sa)住有夏、朱、錢三姓；四十二份部落(baboLsan)住有夏、狸（胡）、錢、蟬（詹）、豆五姓；一百端部落(rakeS)住有夏、朱、高、豆四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不同時代記錄中的賽夏相關聚落

西田又二（1896）	伊能、粟野 (1900)	小島由道（1917）	移川等（1935）	現今聚落對照（2002）
獅里興小東河尾 日阿拐社	獅里興社： 6 小社，273 人	南獅里興社： (250 人) • *Bihi:an* • *Pangasan*	*Sai-raiyen:* • *Parngasan* • *Pakwari*	苗栗南庄蓬萊村部落： 蓬萊(*rayin*) 二坪*(batbato'an*) 大坪(*mamaongan*) 大湳(*tamayong*) 八卦力(*kakahoe'an*)
獅里興 絲大尾社	獅里興口社： 7 小社，147 人	北獅里興社： (123 人) Ririyan		苗栗南庄東、西、南江村部落： 小東河(*kakabaos*) 里金館(*ririyan*) 大屋坑(*raihaba*) 馬果坪(*mahahabun*)
大東河獅頭驛 張有淮社	獅頭驛社： 5 小社，133 人	獅頭驛社： (158 人) • Garawan • *Raromowan* • *Wazwaz*	*Sai-waro:* • *Garawan* (獅頭驛社) • *Raromogan*	苗栗南庄東河村部落： 加拉灣(*garawan*) 向天湖(*raromoan*) 中加拉灣(*lalai*) 三角湖 (*haboe'*)
蕃婆石 籓太龍社	番婆石社： 1 小社，51 人			
		橫屏背社： • *'amis'* • *Morok*		
大東河尾鵝公髻山下 樟阿斗社	鵝公鵠山腳社： 1 小社，81 人	大東河社 *Sai waro*：(38 人) • Siwazay • 'a'owi	*Waro*（大東河社）	東河(*waro*) 鵝公髻(*horork*) 大竹圍(*sewazai*)
鹿場外高買草社				
鹿場口蕃社（不同語言習俗者）				
	新店坪社： 1 小社，70 人	紙湖：(112 人) • 馬陵 • 崩山下 • 坑頭	*Invayus(Marin)*	苗栗獅潭百壽村部落： 百壽、三洽坑、永興、(*marin*、*pensansha*、*hanteu*)
			Karehabasun (Pensansha)	
			Invawan(Hanteu)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加里山下豆流民社	加禮山腳社 1 小社，58 人	大坪 *Sai rawaS*: 大隘社 • 'isa'sa 加里山 • baboLsan 四十二份 • ;ilmok 籐坪 • rakeS 一百瑞 • ray'in 烘簝坪	*Sai-Yaghoru*： 大隘（*Raks*） *Siigao*	新竹五峰大隘村部落： 五峰 上大隘
	梅子坪社(？) 1 小社，47 人	上坪 *Sai KirapaL*：(107 人) • Pi:lay • Sipazi	*Sipaji* *Mailawan*	新竹五峰花園村部落： 比來(*pirai*) 十八兒(*sipaji*)

由日本時代以來的不同記錄，我們可以看見賽夏聚落持續地消長和變化。許多小聚落因遷移而消失，有時社名相同，但內在構成聚落卻完全改變；例如早期組成大隘社的加里山(*'isa'sa'*)、四十二份(*baboLsan*)、籐坪(*'ilmok*)、一百端(*rakeS*)、和(烘)簝坪(*ray'in*)等聚落，皆在日本時代中期以後遷離散盡；現今的大隘社主要是指上大隘、高峰一帶。此外，也有的如橫屏背社，在日本時期爲開發山地移動「隘勇線」，全社被強制遷移他處，原社名也不再使用而逐漸消失。光復後還有許多山區交通不便的小聚落，因居住者逐漸移向附近交通較便利的聚落，造成許多舊聚落荒廢無人居住。[22] 不過，大體而言，一百年來賽夏聚落的移動變化大致還在同樣區域內，並未造成分佈範圍的大幅變動。

近代賽夏相關人群和聚落比較明顯的區域範圍移動變化，應該是在清末，尤其是劉銘傳「開山撫番」時期。從一份清末繪製的「臺灣番地圖」(見圖二)，可以看出當時三灣、南庄、大隘附近「番社」的一些狀況。[23] 其中由咸菜甕撫墾局至大湖撫墾局之間標示有許多番社，由社名可以辨識出的賽夏相關聚落大致涵蓋幾個區域範圍：(1) 三灣以西往南中港溪至獅潭溪之間象山、大河底山附近四社：樟加利社、豆憶德社、周加利社、風帶英社；(2) 三灣附近中港溪右側的下樓社；(3) 南庄附近東河溪往南至汶水河頭之間八社：解淮集社、周加利社、絲打尾社、米阿祿社、潘阿斗社、日阿拐社、高打祿社、樟根

22 最近十年來，隨著臺灣社會地方文化觀光和原住民意識的高漲，不少人又開始返回舊社整理棄屋，或種植作物。

23 本圖現由魏德文先生收藏，原為日軍收藏地圖，購自日本。南庄部分區域圖已經在 2001 年於謝世忠編著的《臺灣原住民影像民族史—賽夏族》一書中；參見謝世忠編著 2001：30。

臺灣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哇社；[24]（4）五指山下至峨眉溪一帶則包括煉簝社、大隘社、十八兒社等社；（5）東河頭至獅頭驛山一帶的樟社和風社；（6）內山地區司馬限和盡尾附近的樟阿祿社。



圖二、清末「臺灣番地圖」南庄周邊各社（原圖為魏德文先生收藏）

這張地圖的卷首附有「自光緒十二年（1886）撫番施行以來，歸化番社超過一百二十社；新舊歸化番社人數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九人」等說明。其中訊息與劉銘傳在光緒十五年（1889）二月十三日上奏『全臺生番歸化匪首就擒請獎官紳摺』中所載的「將新舊歸化番社人數、地址、詳細繪圖，續行呈送軍機處」（劉銘傳 1958: 229-234）；以及伊能嘉矩在《臺灣文化志》提及「光緒 19 年間之臺灣番地圖載撫墾總局之實查稱『光緒 12 年以後之歸化生番社，男婦大小丁口合計一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九人』（伊能 1926: 547）相當吻合。因此，可以推知此圖應該是劉銘傳開山撫番之後上報的番社地圖。雖然全圖原本涵蓋臺灣全島，可看出「開山撫番」時期對全臺「番界線」外之「番地」和「番社」情報知識的掌握狀況；不過，本文僅擷取南庄附近部分，將觀看焦點集中在開山撫番時官方對南庄附近原住民聚落的區辨能力、繪圖表現方式，以

24 其中「周加利社」和「米阿祿社」二社，並非現今使用的賽夏姓；從賽夏襲祖名和圖中聚落分佈地點推測，這二個很可能是「風加利社」和「朱阿祿社」的誤印。筆者從南庄地區的田野調查得知，「加利」(kale) 和「阿祿」(aro)，分別是當地「風」姓和「朱」姓男子傳承的主要名字之一。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其中所見的「賽夏」族群文化訊息。

從圖二標示的社名，可以看見賽夏相關的聚落大致可以分爲二類：（1）以「漢式地名」符號標示的社，如在三灣或南庄開發史料、地契中提到但後來已消失的下樓社（下撈社）、田尾、都瀝口，以及日本時代或至今仍持續使用的大隘社、（焃）簝社、大坪社等。這些聚落大多是漢人移民進入較早，開發歷史較早的地點；使用漢式地名，也顯現出聚落由不同姓氏混居的可能性。（2）另一種則是以「賽夏漢式姓名」符號標示的社，如樟加利社、豆憶德社、風帶英社等。這一類社名大致涵蓋了樟、豆、風、解、絲、朱、潘、日、高、根等 10 個賽夏姓；其社名也暗示了聚落的姓氏屬性和關聯性。相對於周圍許多奇怪難讀、以漢字音譯原住民語的社名，如「民都郁社」、「馬凹社」等泰雅族各社，圖中社名標示的區別現象，似乎也表示了當時撫墾局官員們，對於周邊地區活動的原住民其實已有基本的區辨能力，能夠區分不同「番社」間的特性，同時也採用不同的方法來標示。

從清末這張「番地圖」賽夏相關社名分佈的地點，可以看出後來一些移動變化的重點：（1）賽夏聚落分佈領域明顯縮小；清末「番社圖」中三灣周邊、大河底山附近、汶水河頭、以及司馬盡和盡尾一帶都還有賽夏聚落分佈，但日本時代以後這些地方卻都不再是賽夏聚落的領域範圍。（2）開山撫番時期，三灣外圍還有賽夏聚落。圖上顯示三灣之外四社的位置，非常接近乾隆 55 年（1790）所劃番界線的邊緣；[25] 這些聚落在日本統治初期就已消失，其移動應該與番界線的推移有最直接的關係。（3）單姓小聚落逐漸匯集聚居成多姓聚落。圖中「賽夏漢式姓名」各社，主要以併列散居的方式分佈在數個平行的山脈區域之間；但這些社名後來除了西田又二提到的日阿拐社和絲大尾社外，其他大都消失蹤影。如果將圖中這些賽夏姓名聚落與賽夏各姓相關的遷移傳說對照，可以看出許多姓氏小聚落逐漸向山區幾個重要交匯點遷移聚集，這些地點就是後來記錄中所載的幾個集合性社名，如獅里興社、獅頭驛社、大東河社、橫屏背社、大隘社等。

七、賽夏「姓氏」符號與集群動力

由早期賽夏聚落標示的名稱，我們可以看出姓氏名對於傳達賽夏意象的重要性。因此，重新思考「姓氏」的賽夏社會文化意義，也是理解賽夏族群形塑

25 參考施添福 1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力量的重要關鍵之一。過去在史料記錄中，賽夏「姓氏」大多被解讀爲清朝政府對原住民賜姓的結果，因此是外來的要素，也是代表其漢化程度的證據之一。但是，對於進行實地田野調查的民族學研究者而言，賽夏「姓氏」（賽夏語稱「*sinrayho*」）的獨特名稱和制度，無疑是最核心的文化符碼、社群分類的基礎、和實際行動衍生的機制，對於賽夏族群認同意識具有重要影響。然而，究竟賽夏姓氏是漢化的結果、或是文化認同的機制？二種解讀看似對立矛盾，卻反映出賽夏歷史接觸互動過程的特殊性。

五指山和南庄地區原住民的特殊「番姓」，在清末文獻中已開始受到注意。不過最初只有漢姓記錄，例如在前述 1889 年左右「臺灣番社地圖」南庄附近番社的社名標示中，出現與賽夏有關的「樟、豆、風、解、絲、朱、潘、日、高、根」等十姓。目前所知最先開始對照比較漢姓和賽夏語名稱的是 1894 年的《新竹州采訪冊》，其中記載「合番子番姓」包含「錢、豆、朱、夏、高、日、絲、樟、嬋、蛇」等十姓，每一姓並附有完整的賽夏語漢字音譯資料（見表二）。

對於賽夏「漢姓」的賜姓過程，以及「姓氏」的文化意義，最早提出歷史性解釋的應該是伊能嘉矩。他在《臺灣蕃政志》（1904）與《臺灣文化志》（1926）二書的陳述如下：「道光六年淡水廳下南庄地方一帶開疆設隘，以其土番即 *Saiziett* 的部族爲隘丁，使其防禦其他未化山番時，亦給予漢字之姓稱呼之。原來此部族有一定之表家名，當時乃概意譯之（有一二例外），而以適當之漢字爲姓，蓋亦爲賜姓之一新例。」（伊能 1904: 558）；「道光 6 年淡水廳下淡南一帶番界有番匪滋事，原計畫於該方面擴進防隘，以其土番之一部（自稱 *Saisiett*）以充番丁時，亦普令其稱漢式之姓。乃概對該部族之固有各家名，特配予一姓（多以家名之原意配以漢譯之文字），以融合其血緣集團之舊慣，自創爲賜姓之一新例。」（伊能 1926：662）。二則記錄都提到清朝對南庄地區原住民「賜姓」的歷史，但也強調這些姓氏與固有文化習俗的一些關聯：（1）這些部族原來中就有「家名」；（2）十九世紀初期起，這些人開始擔任清政府的隘丁防守其他「山番」，爲了方便稱呼因而採用他們原有的家名，按照原意以漢字翻譯成爲漢姓；（3）這種賜姓方式是融合部族血緣集團舊有慣習而創出的新例。伊能當時共採集了十一種賽夏「固有家名」和「漢姓」的對照名稱。[26]

26 伊能列出了：Kaivauvao 高、Taotaowarai 豆、Tevutevuon 朱、Sarawan 錢和潘、Hayawan 夏、Varuvai 風、Menrakesi 樟、Kamurarai 蟬、Karakaran 蟹、Toritarishe 絲、Tanihera 日。其中，1926 年的資料，訂正了 1904 年資料中對潘姓和蟬姓原有家名記載的錯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小島由道 1917 年的調查報告則記錄了十六個不同的賽夏姓，其中有二姓已幾乎滅絕。[27] 他提到賽夏「*sinraho:*」與漢姓的關係是：「從同一祖先傳下的血親用同一記號表示，稱為『*sinraho:*』。因其性質與支那的姓完全相同，故在此譯為姓」。此外，他也記載賽夏姓氏的基本原則，通常子從父姓，婦女結婚入夫家仍沿用娘家之姓，不從夫姓；被他姓收養者，則改稱養父之姓（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1998：78、79）。小島之後，大部分調查研究者記錄中都提到還持續的賽夏十四個姓氏名稱。這十四個「*sinrayho*」名稱可說是賽夏社會中傳承使用的重要文化遺產；不過，各姓人數多寡目前差異很大，例如人數最多的如「*titiyon*」（朱姓）約有 119 戶，人數最少的「*kamlala:i'*」（詹姓）僅有 1 戶（林修澈 2000: 248）。雖然賽夏「*sinrayho*」在不同時代採用過漢譯、日譯、羅馬拼音等多種不同文字表達方式，在書寫和視覺呈現上有不少變化；但是透過賽夏語言表達的聲音符號卻一直重複而沒有改變（見表二）。[28]

對於賽夏族獨特的姓氏組織，衛惠林（1956）曾試著賦予理論性的解釋，認爲是圖騰氏族的殘存現象。他認爲賽夏族姓氏組織是以共同父系祖先形成血緣團體，同時配合一套嚴密的「姓氏」(*sinrayho*)符號，將全族分成爲十幾個姓氏氏族。由於這些「姓氏」的賽夏語原意，大多與自然界動物、植物、天文或生理現象有關；而且許多姓氏又有特定祭儀主持權，以及與祭儀相關的神聖起源傳說。因此，他認爲賽夏姓氏應該是圖騰制度殘存的跡象；同時，賽夏父系氏族可說是臺灣僅存的圖騰氏族例證。[29] 這大概是針對賽夏「姓氏」(*sinrayho*) ，將父系血緣、氏族組織、和宗教神聖意涵，擴大連結到最高程度的一種說法。

暫且不論賽夏姓氏制度與圖騰制度的關聯，「姓氏」確實是賽夏人思考和認知人群分類的重要指標，也是賽夏社會關係建構的基本原則。「同姓」成員（「*aehae sinrayho*」）是最基本的外婚單位，不得通婚。祭儀的主祭傳承權利也以特定「姓氏」爲範疇，不同氏族負責不同祭儀的主持；例如目前主要歲時祭典中，「*Titijun*」（朱姓）爲矮靈祭（*paS-ta'ai*）主祭、「*Sawan*」

27 小島記錄中較伊能資料多加了 kaSa:mes 根、Sayna'aSe 九芎、botbotol 狸、kaSramo' 血、Saytibora'an 獅等五姓；其中根姓(kaSa:mes)是由潘姓(Sa:wan)分出，而最後二姓當時已經瀕臨滅絕或已經滅絕。

28 自 2001 年左右起，國家政策開始提倡原住民母語教師認證制度和羅馬拼音教學，促使許多賽夏人興起學習羅馬拼音，也開使用拼音來表現原有賽夏姓氏。

29 參見衛惠林 1956: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二、不同時代記錄中的賽夏相關姓氏名

賽夏 *Sinrayho* 漢姓	新竹州采訪冊 (1894)	伊能嘉矩 (1904、1926)	小島由道 (1917)	衛惠林 (1964)	賽夏母語課本 (2002)
錢	薩老宛	*Sarawan* (錢潘)	*Sa:wan* (錢潘)	*Sharawan*	*Sawan* （錢潘根）
潘					
根			*kaSa:mes*	*Kasames*	
豆(趙)	豆豆亞來	*Taotaowarai*	*Tawtawazay*	*Tautauwaza*	*Tawtawazay* (豆趙)
朱	知知倫	*Tevutevuon*	*Titiyon*	Titjun	*Titiyon*
夏	夏殀灣	*Hayawan*	*Haeyawan*	*Hayawan*	*Hayawan*
高	皆買茅	*Kaivauvao*	Kaybaybaw	*Kaibaibao*	*Kaybaybaw*
嬋(蟬詹)	敢喇喇姨	*Kamurarai* (蟬)	*Kamlala:I'*(蟬)	*Kamrarai*	*Kamlalaai* (詹)
日	噠呢奚喇	*Tanihera*	Tanohila:	Tanohila	*Tanohila*
絲	噠噠裏西	*Toritarishe*	*TataySi'*	*Tataisi*	*Tataysi'*
樟(章)	民六(餌)	*Menrakesi*	*MinrakeS*	*Minrakes*	*MinrakeS* (樟章)
風(楓酆東)		*Varuvai*	*Ba:ba:I'*	*Babai*	*babaai'* (風楓酆東)
解(蟹)		*Karakaran* (蟹)	*Karkarang*	*Karkarang*	*Karkarang* (解)
芎			*Sayna'aSe* (九芎)	*Saina'ase*	*Sayna'aseo'*
胡(狸狐)			*Botbotol*(狸)	*Bubutol*	*Botbotol* (胡)
蛇(獅)[30]	知武喇唵		*Saytibora'an* (獅)		
血			*KaSramo'*		
合計	10姓	11姓	16姓	14姓	13姓

30 此姓現已滅絕；在 1917 年小島由道記錄中提到當時只剩一戶，因不知清國政府用什麼字來記此姓，暫且以「獅」字充當。但經筆者與 1894 年《新竹縣採訪冊》的記錄對照之後發現，該書提到一個現今並不存在的「蛇」姓，賽夏語為「知武喇唵」，其福佬話發音正好與小島所載的「獅」姓「*Say tibora'an*」發音相同。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潘姓）是祈天祭（*a'uwal*）主祭、「*Tautauwazai*」（趙/豆姓）是帝那豆祭（*tinato*）主祭、「*Kayawan*」（夏姓）爲龍神祭（*baki' solo*）主祭等。祭儀中也強調主祭「同姓者」（「*sapan*」）與其他姓氏者（「*a?uma*」）的區別，彼此有不同的權利義務關係。此外，各部落內每一個同姓群體每年定期舉行二次祖靈祭（*pas-bake*），藉此反覆強化對自己家族祖先的記憶和傳承概念。更重要地，不同姓氏間更透過跨姓氏、跨部落的大型祭儀，展現和實踐群體整合意識；尤其在規模最盛大、儀節最繁複、聲色最動人、對外包容性最強烈的矮靈祭（*paS-ta'ai*）中，所有不同姓氏成員共同聚集、分工、敬畏謹慎地依序進行儀式，也成爲賽夏精神呈現最重要的場域。

整體而言，賽夏姓氏是穩定性很高的文化符碼。即使早在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就已使用漢姓，但這些以漢字表達賽夏「*sinrayho*」的漢姓，大多保存了賽夏語原意或特殊語音，而且使用少見的漢姓字彙；因此賽夏漢姓仍然具有族群區辨的特質。[31] 去年（2002 年）賽夏人新近自行編纂的賽夏語羅馬拼音教材，姓氏「*sinrayho*」的賽夏語名稱也是其中最基本的一課。從上表可見不同時期的賽夏姓氏數量記載有增減變化；其中可能反映了資料採集來源的問題，或者有些姓氏因人口滅絕而消失；有時也反映了區辨觀點的差異。例如，賽夏自訂母語教材中界定十三個姓，而平日生活和稱謂中使用十四個姓；其中未被列入的「*kaSa:mes*」（根姓） 雖然在小島的記錄中就已經出現，而賽夏人也認定「*kaSa:mes*」(根姓)是最近百年間從「*Sawan*」（潘姓）分出的新「*sinrayho*」。[32] 但爲何在教材中還是併入「*Sawan*」？根據報導人的說法是：「傳統姓氏」教學最重要的是要讓下一代賽夏人清楚記得祖先和遵守「同姓」不婚的祖先規矩；因此「*kaSa:mes*」的成員必須記得是「*Sawan*」的一支，不能和「*Sawan*」通婚；所以，還強調彼此是同一「*sinrayho*」成員。現代母語教學，仍然明顯地強調賽夏「姓氏」符號內在所蘊含的基本價值觀。

如果將賽夏「姓氏」，回歸到伊能所提的「原有家名」概念來看，也許更能顯現其中地緣和血緣交錯的雙重性。至少在清末時，還有許多小型賽夏「*sinrayho*」集團，聚居形成一個聚落，共同進行開墾、築屋、組織獵隊等實際生活行動，也是共同祭祀的團體。這樣的「*sinrayho*」社群雖然具有血緣基

31 在賽夏起源傳說中，認為賽夏人和泰雅人最大差別，就是泰雅人沒有「*sinrayho*」(姓氏)；陳春欽 1966:158-159。現今雖然賽夏人也使用漢字書寫漢譯姓氏，但因這些姓用字特殊，不是一般常見的漢姓，因此仍然是區辨賽夏人和漢人的重要標示。

32 賽夏人的解釋是：當「*Sawan*」（潘姓）要從獅潭附近向南庄遷移時，有一群人不願意移動而留在原地；這一群人表示要在當地生根，因此稱為「*kaSa:mes*」（根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礎，但血緣並不見得是絕對的條件，而具有更多生活實質分享的性質。總之，「家名/姓氏」符號的文字化，使得個人和「家族/姓氏」集團的關係更加固定，即使在流動遷移過程中，同源共祖的意識藉著「家名/姓氏」而更加強化。同時，隨著人群的遷移和聚落的重組，「家名/姓氏」可能成爲更重要地社群互動和族群意象建立的文化符碼。

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南庄周邊地區這一群人無論是否稱爲「賽夏」，即使他們不斷因應南庄地區開發過程中帶來的政治經濟資源變化，而移動調整人群生活模式和聚落分佈範疇，但藉由一些可以區辨且共同認知分享的獨特行爲方式，而能建立和維持密切互動的社會關係。因此，這個群體雖然表現出高流動性、高合成性、和快速吸收運用外界資源要素等特質，但透過「家名/姓氏」的文化編碼機制，以及各種儀式操作過程的具體化，使得群體分類秩序和文化整合意識的溝通和表達具有實質意義。因此，雖然長期以來賽夏人的生活空間中環繞著人數更多、更強勢的「異族」，他們也頻繁地與異族通婚和收異族養子或義子，但卻沒有破壞或「污染」賽夏的集體意識，甚至還成爲內化外來成員和增強社會聯盟關係的基礎。也因此，即使前面提到的幾個歷史上著名的南庄地區頭目，如日阿拐、絲大尾等人，雖然就血緣而言，都是被賽夏人收養的漢人，但由於他們都具有賽夏「家名」或「姓氏」，也持續在區域生活中以賽夏人的行爲模式與他人進行社會互動，因此也是大家所認同的「賽夏人」。

換言之，賽夏族群邊界的形塑，或許本質上就具有滲透性和附加性。而「家名/姓氏」是最具體的符號和動力；不同來源的人，可以透過婚姻和收養等方式取得賽夏特有的「家名/姓氏」，而成爲賽夏的一員。甚至，在特殊狀況下，是否也可能有其他遷移至此的新社群，藉著帶入新「家名/姓氏」的方式併合進賽夏的「家名/姓氏」之中？從過去歷史記載中所稱的「合番」概念，或是矮靈祭歌中呈顯的疊影效果，[33] 似乎也隱約地呼應了一些可能性。

八、結論：姓氏、聚落與族群

總之，現今的賽夏族群意象，是歷經不同時空架構，內外多重要素持續互動交織對話的結果；同時，族群邊界，也不是靜態穩固的，而是隨著歷史發展過程而變化。不過，在時間流動變化中，卻又凸顯出一些文化核心符碼或機

33 參見胡台麗 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制，是族群意象再現和具體化的關鍵動力。這種動態變化的過程，正是外界環境刺激與文化基本架構不斷地碰撞和相互運作的結果，促使文化觀念不斷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考慮選擇中重新調整和再結構，這種現象至今還持續反覆進行中。從 2002 年南庄地區賽夏族人進行的一次傳統領域調查，也可以看見不同程度古今和內外對話的過程。這項調查計畫主要目的是希望讓原住民以在地人的觀點，展開自己部落傳統領域的調查和繪製，並藉此召喚部落成員對傳統生活空間知識的回憶；賽夏當地的文化工作者也參與了計畫工作。[34]

以南庄地區蓬萊部落的地圖繪製爲例，部落內進行了長老訪談、實地踏查和社區座談；另外也參閱了外界出版的文獻記錄和區域地圖。[35] 最後完成的二張手繪地圖，融合吸收了外來的材料，但卻仍然具有「原住民的歷史文化經驗」再現的效果。其中一張「蓬萊部落傳統領域地圖」，輾轉反映出賽夏「部落」的一些基本性質（圖三左）[36]。這張圖繪製的蓬萊部落範圍，正是前述歷史材料中提到的「南獅里興社」、「日阿拐社」、或「巴卡散社」(Parkasan)。圖中繪製賽夏人記憶中曾在此區居住過的地點；其中呈現的聚落分佈方式，若與記錄賽夏聚落的歷史材料配合來看，大致可以看出二個現象：（1）歷史材料中所記載的「社」，讓人假想爲一個有組織有邊界的聚居村落；但此地並沒有一個大型聚居村落，也沒有明確的村落組織和界線；而是由多個零散小聚落構成的活動區域。所謂的「社」或「部落」範圍，主要是一些小聚落中居民的日常活動範圍，大致以四周圍環繞的高山稜線做爲自然邊界。（2）蓬萊部落雖然是歷史記載中賽夏著名土目日阿拐擁有或控制的範圍，但是現今部落意象的再現，卻並未提到日阿拐；圖中繪出的記憶中賽夏人居住地點，如 *kalopotoehan*, *ray batoki*, *ray hio*, *rayin*, *anmohwan*, *kas kasahwan*, *ray tinawbon*, *batbato'an*, *mamaongan*, *tamayong*, s*ay kinbow'an* 等，都是以當地地形或日常活動的特性命名。

34 這項計畫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執行；計畫時間由 2002 年 1 月至 6 月，共有 11 族 30 個部落參加；其中賽夏有新竹五峰鄉大隘和苗栗南庄鄉蓬萊二個部落參與。各部落的地圖主要由部落成員自行決定呈現方式和繪製；最後再交由地理專家運用現代科技加以數值圖和立體模型化處理；參見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2002。

35 主要參與人員是蓬萊部落的 Tanohila(日)姓和 Sawan(錢)姓，其他協助提供資料的人還包括 Babaai'(楓)姓、Titiyon(朱)姓、Kaybaybaw(高)姓、MinarkeS(章)姓、Sawan(潘)等姓。

36 這一張地圖經過數值化處理後，已放在計畫報告中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2002: 13、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外一張地圖，原先希望繪製「部落遷移歷史地圖」，但最後卻轉換以「賽夏族遷移史」地圖的方式呈現（見圖三）。這樣的轉換也顯現出部落的特性與遷移模式；由於現今的部落，並不是一個整體集團性遷移形成的聚落，而是由多個不同姓氏小團體，在不同時間、由不同地點輾轉遷移來到此地交匯聚集。因此，追溯一個部落的遷移歷史，就是追溯匯集到此處不同姓氏集團的遷移歷史，而各姓氏集團的遷移歷史與族群遷移的歷史根本無法難切割。因此，繪製此圖必須處理現存許多記錄資料的差異和各姓氏遷移記憶的分歧；能夠具體化成爲一張地圖，不但包括對歷史材料和經驗記憶的收集，更涉及對材料和記憶說詞的選擇和再現。這張地圖，最後描繪賽夏族從玉山開始、經臺中豐原、北上到桃園大溪、再南下至日月潭、轉大霸尖山、之後遷到竹北和後龍、再由後龍轉至南庄和五峰一帶（圖三右）。這個遷移路線將賽夏遷移歷史分爲七段：「卜翁」（*oppeoh na boon*）、「雷神」（*biwa*）、「織女」（*waen*）、「達愛」（*ta'ai*）、舒魯（*sorou*）；主要交織再現了賽夏各姓氏主持的重要儀式和傳說中的「先靈」（*taitinii*）們，並且吸收一些外界研究者對於賽夏族與「道卡斯」和「巴宰」關係的論述。總之，藉由這個管道再度凸顯出，族群遷移與姓氏之間、姓氏與儀式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是不可忽略的賽夏記憶焦點。同時，由於各姓氏甚至個人對於遷移記憶的分歧，最後地圖定調的過程，也運用了賽夏社會對於分歧議題協調處理的習慣傾向和原則－各姓氏間的平等性、儀式相關特定「姓氏」的權威性、以及強烈意見表達者的較高考慮性。[37]

透過「賽夏」二百年來發展與接觸變遷的例子，我們可以看見在歷史過程中族群概念的具體化和強化，是受到新竹苗栗交界山區的人群接觸、交易、移墾、殖民、軍事和行政區劃等各種政治經濟活動的影響；不過，文化核心觀念和結構原則，也持續地與現實生活中不斷變化的要素交錯複雜地對話。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從靜態、固定的血緣、地緣或文化的要素來定義族群，顯然是不足的；賽夏族群邊界是隨著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生活環境的改變而流動。但是，外來刺激雖然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文化架構中的內在趨動力也不容忽視；因此，透過歷史的動態變化過程，反而又凸顯出一些特定的變化方向或原則；

37 關於神話中船說的賽夏各姓是起源的「*oppeoh na boon*」（卜翁）究竟是住在哪一座高山？目前大多數賽夏人的說法認為是大霸尖山，但本圖中所繪的是玉山。繪圖者的解釋為：大部分人都只是猜測性的意見，但提到玉山是起源點的長老則非常堅持他的意見；而且「*oppeoh na boon*」祭儀是屬於「*Babai*」（風姓）的儀式，堅持玉山說法的長老屬於風姓，所以最後以他的意見為繪圖根據。其中也借用了一些文獻中轉借而來的名詞概念和歷史關係論述，如道卡斯(Taokas)和巴宰(Bazahe)等。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例如，「開山撫番」以後聚落遷移和賽夏聚落性質的反映，以及賽夏「家名」至「姓氏」的轉換。不過，文化中的價值結構無法自動延續和維持，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人在具體的社會行動中，透過反覆再現的一些文化符碼刺激，持續轉化形成生活經驗；同時也不斷地在生活中整合認知意識而共同行動。總而言之，細密地檢視族群歷史文化脈絡中多元動態的關係運作網絡，不僅是討論賽夏族群邊界的重要基礎，也是理解實際社會生活中，當代與過去、內部文化價值觀與外在刺激，如何持續互動的關鍵。當然，這些問題需要更深入的討論與發展，也有待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更進一步的思考與密切對話。



圖三、賽夏族蓬萊部落地圖[左] 與遷移史地圖[右]
（武茂・叭細・撒萬繪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 用 書 目

小島由道、安原信三

1917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 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26 《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

三田裕次收藏、張炎憲編

1988 《臺灣古文書集》，臺北：南天書局。

不著撰人

1962 [1894]《新竹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145 種。

不著撰人，〈熟蕃卜合蕃〉，收入臺大「伊能文庫」中「臺灣地理資料：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鳳山、恆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1998[1917]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江日昇

1960[1704] 《臺灣外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西田又二

1896 〈新竹縣南庄地方林況〉，《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報文》第一卷第二月，東京：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

伊能嘉矩

1898a 〈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　分佈，『臺灣通信』第 22 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46，1898/5。

1899 〈臺灣　於ケル「ベイポ」族ノ概察〉，『臺灣通信』第 28 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54：126-136。

1902 《臺灣志》(卷壹)、(卷貳)，東京： 文學社。

1904 《臺灣蕃政志》，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1928 《臺灣文化志》(上)、(中)、(下)，東京：刀江書院。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

1900 《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文書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伊能嘉矩著、楊南群譯註
1996 《伊能嘉矩踏查日記》，臺北：遠流出版社。
何培夫
1998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苗栗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李光濤等編
1953 《明清史料戊編》(第三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佐山融吉、大西吉壽
1923 《生蕃傳說集》，臺北：臺灣總督府蕃族調查會。
林欣宜
1999 《樟腦產業下的地方社會與國家—以南庄地區為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
林修澈
2000 《臺灣原住民史——賽夏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波越重之
1985 [1907] 《新竹廳志》， 臺北： 成文書局復刻。
吳善祖
1987 〈清代「淡新檔案」——臺大圖書館的新特藏〉，《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 40 期，1987 年 6 月。
吳密察主編
1995 《國立臺灣大學藏伊能文庫目錄，臺灣史檔案、文書目錄(三)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施添福
1990 〈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臺灣風物》，第 40 卷第 4 期，1990 年 12 月。
胡台麗
1995 〈賽夏矮人祭歌舞祭儀的『疊影』現象〉，《中研院民族所集刊》79: 1-27。
胡家瑜
2000 〈器物、視覺溝通與社會記憶—賽夏儀式器物初探〉，《臺大考古人類學刊》55：113-1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孫爾準著、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稿本叢書編委會編輯
1987 《孫文靖公奏牘稿本（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稿本叢書 3）》（內容收錄 1825–1831 年間所撰奏摺），北京：天津古籍出版社。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1935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
番業主蕭瑞雲抄錄編輯
1896 《屯番魚鱗冊》，採自中央研究院古文契書資料庫，編號 f01–01–014。
森丑之助著、宋文薰編譯
1977 [1915] 《日據時代臺灣原住民生活圖譜》（臺灣蕃族圖譜），求精出版社。
陳文玲
1999 《臺灣先住民族サイシャット（賽夏族）のエスニック・關する考察》， 東京都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碩士論文。
陳培桂
1963[1871] 《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
陳淑萍
1998 《南賽夏族的領域歸屬意識》，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朝龍著、林文龍點校
1999[1894]《新竹縣采訪冊》（合校足本），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陳運棟、張瑞恭
1994 《賽夏史話矮靈祭》，華夏書坊。
陳運棟
1987 〈黃祈英事蹟探討，收入《臺灣史研究史料發掘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研究組。
黃叔璥
1957 [1736 序] 《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
黃煉石著、伊能嘉矩抄錄
〈奉查南庄開闢緣由序〉，收於臺灣大學藏「伊能文庫」中「臺灣地理資料：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鳳山、恆春」，微捲編號 T0021/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資源學系
2002 《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資源學系。
鄭依憶
1989 〈血緣、地緣與儀式：向天湖賽夏族三儀式之探討〉，《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67：109-142。
潘秋榮
1999 《賽夏矮祈天祭的研究》，政大民族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藏，「淡新檔案」。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9 《臺案彙錄甲集》，臺北：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31 種。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3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北：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152 種。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4 《清宣宗實錄選輯》，臺北：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188 種。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1989 [1918]《理蕃誌稿》，東京：青史社復刻版。
衛惠林
1956 〈賽夏族的氏族組織與地域社會〉，《臺灣文獻 》7 (3/4): 1-6。
衛惠林
1964 《台灣省通誌稿卷八—同胄志（賽夏族)》，台中：臺灣省文獻會，139-159。
謝世忠編著
2002 《臺灣原住民影像民族史—賽夏族》，南天書局。
劉銘傳
1958 《劉壯肅公奏議》，臺北：臺灣銀行，臺灣研究叢刊第 27 種。
羅大春
1972 [1874–1875]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北：臺灣銀行，臺灣研究叢刊第 308 種。
鷹取田一郎
1916 《臺灣烈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ureau of Aboriginal Affairs.

1911 *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Taihoku, Formosa: Bureau of Aboriginal Affairs, 1911（本書收藏於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

Comaroff, John & Jean Comaroff

1992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pp. 3-48, Westview.

Gurevich, Aaron

1992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oskins, Janet

1993 *The Play of Time: Kodi Perspectives on Calendars, History, and Exchange.*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Levi-Strauss, C

1963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lated by J. Russell, New York: Atheneum.

Sahlins, Marshall

1985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